

数字人文视域下《人民日报》建构的 “幸福”概念演变研究(1949—2024)

闫 潼 吴欣翼 胡开宝

摘要: 提高国民幸福感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但对于“幸福”的本质却充满争论。探讨“幸福”概念的发展演变不仅可以反映人民对幸福本质认知的变化,还能揭示概念演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本研究将数字人文与概念史研究相结合,借助《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利用基于形符的语义向量空间模型,理清1949年至2024年间“幸福”概念语义演化的历时特征。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国民对“幸福”的关注度呈现整体增强趋势,“幸福”概念经历了“世界性到民族性”“被动性到主动性”“科学化”“内外兼具,不断丰富”的演变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思潮、执政理念等宏观社会因素以及有关幸福的重大社会事件等微观因素是“幸福”概念演变的重要驱动力。

关键词: 幸福;数字人文;语义向量空间;数字概念史;《人民日报》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5.05.010

引 言

数字人文“是将人文学科知识、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算法模型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旨在考察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去提升和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①,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动态性和创新性。它不仅着眼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还催生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和新问题。在此背景下,“数字概念史”(Digital Conceptual History)应运而生。^②它是将数字人文理念引入概念史研究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跨领域研究方法,提倡以概念为研究对象,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技术支撑,探究词义情感变化、新旧词义更迭、词义范围变化等内容,以揭示重要基本概念的发展历程,特别关注概念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数字概念史研究打破了传统近读方法的禁锢,通过文本挖掘方法,从宏观远读视角展现概念的发展脉络,有助

作者简介:闫潼,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上海,201620)。吴欣翼,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上海,201620)。胡开宝,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201620)。

① 胡开宝、黑黝:《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特征、领域与意义》,《中国翻译》2020年第41卷第2期,第5—15页。

② Joris van Eijnatten, Ruben Ros, “The Eurocentric Fallacy. A Digital-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Concepts of ‘Modernity’, ‘Civilization’ and ‘Europe’ (1840—19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History, Culture and Modernity*, vol. 7, no. 1 (November 2019), pp. 686—736.

于发现文本背后的新趋势、新模式与新关系。一些学者探究了“世界”^①“农民”^②“中国式现代化”^③等中国近现代重要概念的演变历程,为数字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

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④概念是思想的结晶,也是建构的力量。其中,“幸福”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代表性概念之一。“幸福”不仅是人类共有的追求,具有普世意义,还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得到高度承认。2011年,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将“幸福”纳入国家发展指数考核,多国将其列入主要政策目标。可见,“幸福”成为个人生活、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文明持续的导向标。概念的生命力并不在于静止,而在于动态传播与影响。探讨“幸福”概念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蕴,不仅可以反映人民对幸福本质认知的变化,还有助于揭示概念演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为社会大众认识幸福、增强幸福感提供学理支撑。因此,本研究将概念史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相结合,借助《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利用基于形符的语义向量空间模型,理清1949年至2024年间“幸福”概念语义演化的历时特征,探究中国的“幸福”概念参与时代建构的方式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图景。

一、“幸福”概念的相关研究

学者对于“幸福”概念的思考自古即始,但最初仅限于概念解释与理论研讨,例如《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幸,吉而免凶也”“福,祐也”,即幸福就是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小尔雅》记载“非分而得谓之幸”;《老子》中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论断,认为免于祸患即为福。可见,在古汉语语境中,“幸福”是指人生中幸运的、好的或完美的境况^⑤,较为依赖上天或命运,突出对生活客观状况的描述,未强调主体的感性体验。但进入现代社会,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幸福”概念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化、多维化、复杂化。尤其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使价值观发生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人的主观感受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⑥,学者从哲学^⑦、社会学^⑧、心理学^⑨、认知语言学^⑩

-
- ① 邱伟云、郑文惠:《走向新世界: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57卷第5期,第88—106页。
- ② 刘知远、刘扬、涂存超等:《词汇语义变化与社会变迁定量观测与分析》,《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卷第6期,第47—54页。
- ③ 尹丽君、朱一凡:《数字人文视域下非洲与拉美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阐释——以 Factiva 数据库的英语新闻为例》,《外语电化教学》2024年第2期,第38—46页。
- ④ 方维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以科塞雷克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4—131页。
- ⑤ 邓莉:《美好生活观及其现代转变——一个概念史的考察》,《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第61—65页。
- ⑥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103—108页。
- ⑦ Isabelle Wienand, “Discourses on Happiness: A Reading of Descartes and Nietzsche,” *Ethical Perspectives*, vol. 16, no. 1 (January 2009), pp. 103—128.
- ⑧ Maite Garaigordobil, “Predictor Variables of Happiness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Heal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6 (August 2015), pp. 112—156.
- ⑨ Fan Yang, Joshua Knobe, Yarrow Dunham, “Happiness Is from the Soul: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Our Happiness 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50, no. 2 (February 2020), pp. 276—288.
- ⑩ Van Trao Nguyen, “The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Vietnamese Idioms Can Tel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14, no. 2 (December 2016), pp. 275—302.

等角度对“幸福”加以阐述,构成了“幸福”概念的丰富理论境遇。

整体来看,前人对于“幸福”概念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注重“幸福”概念的哲学内涵与心理认知机制考察,对概念史的关注不足。其中 Shigehiro Oishi 等借助韦氏词典和《国情咨文》分析了英语的“happiness”,发现其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外在一内在”的转变^①;关于中国“幸福”概念的演变特征仍有较大探索空间,其背后的社会驱动值得深入挖掘。其次,在研究时间上,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时间段的共时分析,较少探讨“幸福”概念在历时维度上的演变轨迹。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运用实证方法的较少,且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多为利用问卷调查和量表开发实验,鲜有使用数据驱动的文本挖掘方法。基于此,本研究利用数字人文技术,探讨“幸福”概念的跨时空旅行。研究问题如下:

1. 1949 年以来“幸福”概念的使用频次有何历时演变趋势?
2. 1949 年以来“幸福”概念的具体内涵有何历时演变趋势?
3. “幸福”概念演变背后的社会驱动力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

为解决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以德国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理论与框架语义理论为基础,借助语义向量空间模型,追踪《人民日报》话语符号背后的“幸福”概念演变与历史纵深。

(一) 研究所用语料

本研究所用语料来源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②,因为它收录了《人民日报》创刊至今的所有新闻报道。选取 1949—2024 年为时间阶段,原因有:1. 历史节点的重要性。这一时间段涵盖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阶段,能够较为全面覆盖“幸福”概念的表现和变迁。2. 语料的可获得性。《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最早收录时间是 1946 年,1946—1949 年间关于“幸福”的文章较少,单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效果不理想。3. 研究范围的合理性。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一个历史时期,有助于保持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

基于此,我们将标题检索词设置为“幸福”,收集相关文章 2 956 篇,建成《人民日报》“幸福”语料库,并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③,以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时段划分标准,将语料分为 5 个子库,分别对应不同时间段。子库 1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子库 2 至 4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子库 2 时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子库 3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子库 4 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子库 5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间对应党的十八大以来。语料库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① Shigehiro Oishi, Jesse Graham, Selin Kesebir, et al., “Concepts of Happiness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9, no. 5 (April 2013), pp. 559—577.

②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网址为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30815/1?code=2>。

③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

表 1 《人民日报》“幸福”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名 称	时 间	篇目数量	形符数
总语料库	1949/10—2024/12	2 956	438 177
子库 1	1949/10—1978/12	670	88 623
子库 2	1978/12—1989/06	96	7 939
子库 3	1989/06—2002/11	154	14 023
子库 4	2002/11—2012/11	630	96 143
子库 5	2012/11—2024/12	1 406	231 449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德国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理论为基础,因其采用“历史语义学”模式^①,不单单研究语言的含义及其历时性变化,还强调语境中意义的生成。^② 科泽勒克认为概念分析有两个关键层面:一是概念的具体语言使用,二是概念运用时的具体社会状况或结构。^③ 这意味着,概念史研究需将语言置于历史变迁中考察,结合社会语境解读词语与文本的意义。词语的涵义同时也是宏观与微观历史现象^④,因此在社会语境中,宏观与微观社会因素共同驱动概念演变。

在语义分析层面,本研究借鉴框架语义理论。框架是源于人类生活经验的认知概念结构,特定的词语在记忆中与特定的框架相连,适当语境下接触某词语会激活话语理解者大脑中与之相连的框架,并加强该词语与同一框架中其他词语的连通。^⑤ 可见,某一框架内的词汇和框架相辅相成,词汇激活框架,框架确定词义。^⑥ 基于此,本研究从框架与词汇的互动视角具体阐述概念的语义内涵。

(三) 研究步骤

本研究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一方面借助基于形符的语义向量空间(Token-based Semantic Vector Spaces),挖掘概念语义演变的实证数据;另一方面,结合文本细读与质性分析,解释数据呈现的特征内涵,并揭示概念演变的社会驱动因素。本研究的

①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20 页。

② 彭青龙:《概念史与比较文学中的思想和方法——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方维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第 1—13 页。

③ 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 185 页。

④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19 页。

⑤ Charles J. Fillmore, “Frame Semantic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280, no. 1 (October 1976), pp. 20—32.

⑥ 马伟林:《框架理论与意义识解》,《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 年第 10 期,第 18—21 页。

技术路线基于分布式语义(Distributional Semantics)思想^①,利用词向量(Word Vector)的方法来表征词汇语义,构建基于形符的语义向量空间。传统的语义向量空间大多是基于类符的,更适合比较不同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而基于形符的语义向量空间则能够表征目标词所出现的每个索引行的语义,更适合用来比较同一词语的不同意义。该方法由 Heylen 等提出^②,又经过了 Hilpert 与 Saavedra 的验证^③。研究具体步骤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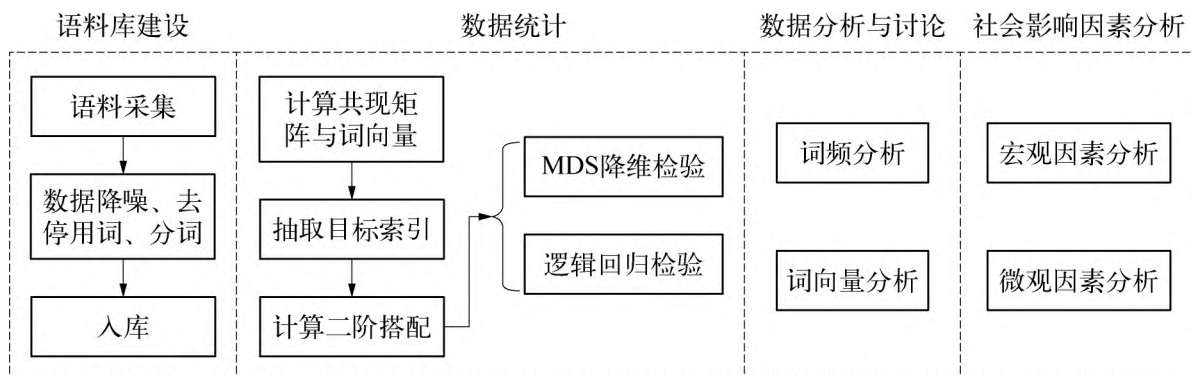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步骤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结果与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路径与方法,本文围绕“幸福”的词频变化与词向量分布展开数据分析,并结合宏观与微观社会因素,进一步揭示概念演变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幸福”概念的词频分析

我们统计了 5 个子库中“幸福”的词频分布,并标准化处理以排除各子库时间跨度不一致的影响,结果如图 2 所示。

整体来看,《人民日报》中“幸福”的年平均词频呈现“先降后增,整体上升”趋势,说明 1949 年至今,社会对幸福的关注具有持续性和增强性的鲜明特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幸福”便成为《人民日报》的关注议题;但在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末这段时间,社会对幸福的讨论度略有降低;进入 21 世纪后,“幸福”成为国民关注的重要话题。《人民日报》热议幸福是人民认识幸福、提倡幸福、追求幸福的社会生活缩影。

① John R. Firth,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pp. 1—32.

② Kris Heylen, Dirk Speelman, Dirk Geeraerts, “Looking at Word Meaning: An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of Semantic Vector Spaces for Dutch Synse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EACL 2012 Joint Workshop of LINGVIS & UNCLH*, 2012, pp. 16—24.

③ Martin Hilpert, David C. Saavedra, “Using Token-Based Semantic Vector Spaces for Corpus-Linguistic Analyses: From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Tests of Theoretical Claim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16, no. 2 (September 2017), pp. 393—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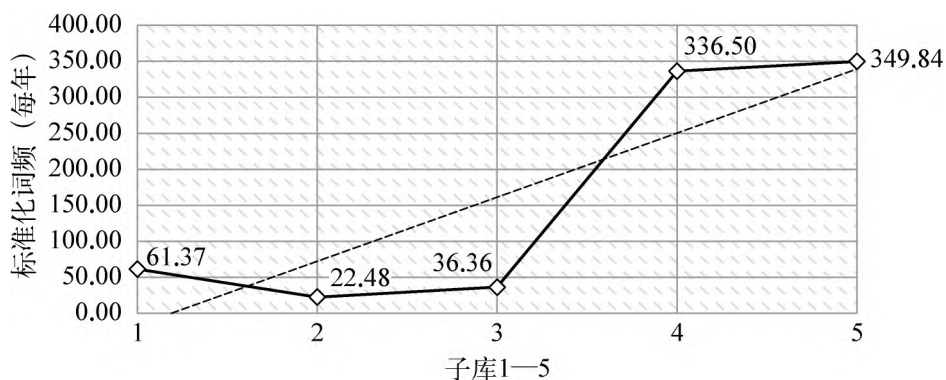


图2 《人民日报》“幸福”语料库中“幸福”年平均标准化词频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幸福”概念的词向量分析

我们将余弦距离矩阵降为二维并用逻辑回归计算准确率, 降维后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子库1与子库2在“幸福”二阶搭配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准确率为86.92%), 而子库2与子库3、子库3与子库4、子库4与子库5则可以明晰地区分“幸福”的语义(准确率为94.50%, 93.89%, 95.27%)。这说明, 1949年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幸福”概念的内涵在发生变化, 其中子库1时期和子库2时期“幸福”词义变化较小, 而自此之后“幸福”语义的变化较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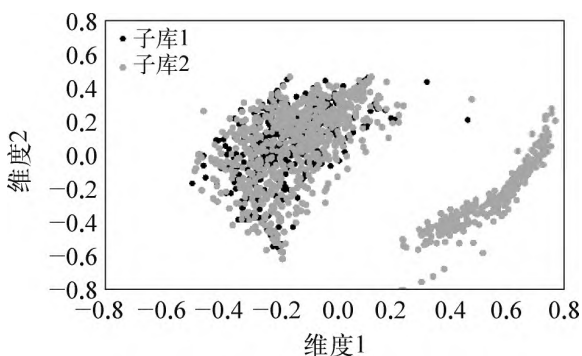


图3-1 子库1与子库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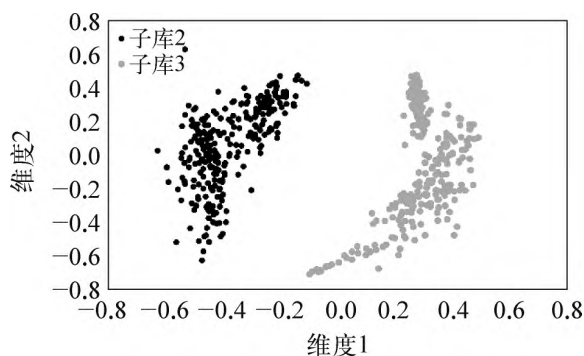


图3-2 子库2与子库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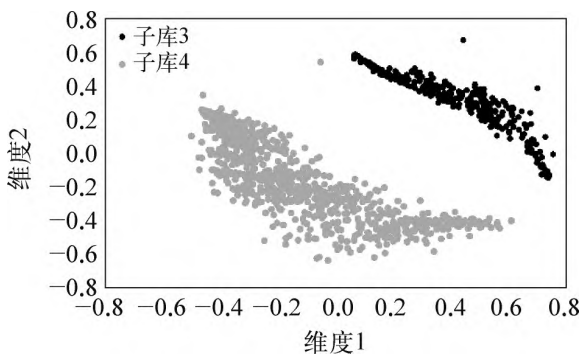


图3-3 子库3与子库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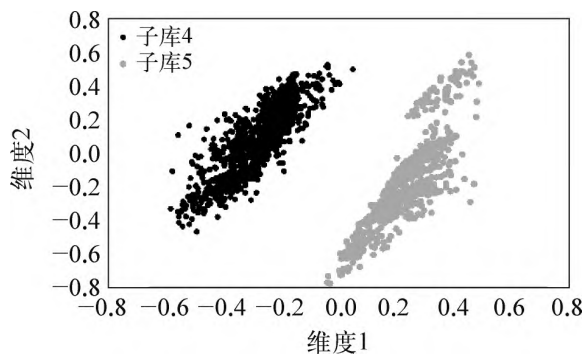


图3-4 子库4与子库5

图3 各子库与前一子库“幸福”二阶搭配 PPMI 值的余弦距离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子库中“幸福”的具体含义,我们提取了 PPMI 值排名前 30 的“幸福”二阶搭配词(如表 2 所示),并结合文本对“幸福”的词义演变做具体分析。

表 2 各子库中 PPMI 值排名前 30 的“幸福”二阶搭配词

名称	“幸福”二阶搭配词 (PPMI Top 30)
子库 1	0.323*“困难”+0.300*“斗争”+0.276*“主席”+0.265*“紧密”+0.259*“世界”+0.253*“沙子”+0.247*“团结”+0.241*“土地”+0.238*“全人类”+0.235*“陆续”+0.233*“农场”+0.233*“派出”+0.233*“读书”+0.233*“观感”+0.233*“歌颂”+0.231*“穿着”+0.231*“感动”+0.231*“衣”+0.231*“讨饭”+0.231*“家”+0.230*“赞扬”+0.230*“走上”+0.230*“苏联”+0.229*“光荣”+0.229*“大炮”+0.229*“健康”+0.229*“到达”+0.229*“忠诚”+0.228*“期望”+0.228*“山河”
子库 2	0.320*“访问”+0.308*“团结”+0.308*“地区”+0.308*“领导人”+0.304*“全家”+0.303*“报道”+0.302*“吃饭”+0.302*“学习”+0.299*“住”+0.299*“走进”+0.298*“称赞”+0.295*“世界”+0.294*“童年”+0.294*“来信”+0.293*“困难”+0.292*“照片”+0.292*“人类”+0.292*“激动”+0.291*“祝愿”+0.290*“感谢”+0.290*“德国”+0.289*“关心”+0.289*“战友”+0.289*“温暖”+0.289*“养老院”+0.289*“身体”+0.287*“人口”+0.287*“丈夫”+0.286*“企业”+0.284*“外侨”
子库 3	0.468*“家庭”+0.468*“市场”+0.459*“文明”+0.459*“推动”+0.458*“人民”+0.458*“我家”+0.449*“民主”+0.449*“经济”+0.449*“讲”+0.443*“住”+0.443*“吃”+0.443*“表现”+0.443*“群众”+0.441*“中国”+0.439*“资金”+0.439*“自己”+0.438*“照顾”+0.438*“指导”+0.438*“治病”+0.437*“治穷”+0.437*“愉快”+0.437*“增长”+0.435*“女儿”+0.435*“平等”+0.434*“治愚”+0.434*“实行”+0.434*“全国”+0.430*“思想”+0.430*“意义”+0.428*“计划生育”
子库 4	0.398*“中国”+0.317*“公司”+0.314*“棋牌室”+0.314*“活动室”+0.314*“经济”+0.314*“家庭”+0.314*“指数”+0.314*“收入”+0.314*“楼宇”+0.313*“出发点”+0.313*“群众”+0.313*“住户”+0.312*“调查”+0.312*“经济学”+0.312*“教育”+0.311*“尊严”+0.311*“赶赴”+0.311*“自己”+0.310*“人民”+0.310*“思维”+0.310*“和谐”+0.310*“治安”+0.309*“并重”+0.308*“笑声”+0.308*“数据”+0.308*“研讨会”+0.307*“高速公路”+0.307*“远景”+0.307*“腾飞”+0.307*“上网”
子库 5	0.431*“中国”+0.428*“奋斗”+0.422*“中国梦”+0.413*“蓝天”+0.410*“绿水青山”+0.403*“家庭”+0.398*“个人”+0.367*“指数”+0.352*“教育”+0.350*“自己”+0.335*“群众”+0.328*“胜利”+0.324*“奋进”+0.310*“环境”+0.310*“滑雪”+0.309*“健康”+0.307*“数据”+0.303*“老百姓”+0.299*“经济”+0.298*“体育事业”+0.297*“建设”+0.297*“温暖”+0.288*“十九”+0.287*“贯彻”+0.285*“调查”+0.283*“锻炼”+0.275*“好日子”+0.274*“餐桌”+0.265*“新年”+0.253*“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幸福”：从世界性到民族性

在子库 1 中,“世界”“全人类”“苏联”等词汇常出现在“幸福”的语境中,并指向“世界”框架。这一时期的“幸福”概念具有世界性,既体现为对苏联幸福生活的着重描绘,也表现为将全人类的独立、自由与解放视为幸福目标。

子库2与子库1相近,除了“世界”“人类”,“德国”“外侨”等词汇亦成为“幸福”语境中的密切关联词。这一时期,出现大量报道描述“他国式”的幸福,例如“民主德国采取多种措施,保证老人晚年生活幸福”^①“匈牙利领导人指出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②等,以他国的幸福为借鉴与启示,借助世界成员主体构建起“世界”框架,亦体现了中国幸福概念的世界特征。

而在子库3、4和5中,“世界”“人类”等词汇不再出现在“幸福”的Top30二阶搭配词中,“中国”“自己”“中国梦”等词出现其中,并关联“民族”框架。这表明中国逐渐摆脱他国模式的影响,开始聚焦本民族的幸福生活,构想符合中国未来道路的幸福图景。

“世界”框架词的消失与“民族”框架词的出现,表明中国从参考他国范式、借鉴世界经验转向自主构建“幸福”。这一时期的“幸福”是独属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性。

2. “幸福”:从被动性到主动性

在子库1中,“幸福”的Top30二阶搭配词中出现了“主席”“歌颂”“赞扬”等词汇,这些词共同激活“他者”框架。作为幸福感受主体的人民,其幸福来源并非自我,体现出“幸福”的被动性。子库2中同样如此。在子库3和4中,出现了“人民”“群众”等词汇,它们作为角色指称共同指向“民众”框架,强调“人民生活的幸福”“群众日子过得幸福”,“幸福”概念的被动性逐渐减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子库5中,除了“群众”“老百姓”外,“个人”“自己”等词汇成为“幸福”的密切二阶搭配词。“个人”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己”则反映个体的自我认知,它们共同激活“自我”框架。幸福不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源于主观能动的行为与举措,更加强调自我价值,幸福的主动性凸显。

3. “幸福”的科学化

表2中,子库4和5中出现了子库1—3均未出现的词汇,如“指数”“数据”“调查”“研讨会”“经济学”等,指向测量工具、研究方法、学科领域和知识交流平台等知识域,共同激活“科学”框架。我们提取相关索引行制成表3。由表3可知,进入21世纪,幸福不再是随意描述的主观感受,而是需要利用科学方法、采取严谨手段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与之前阶段对于幸福的零散谈论不同,自子库4时期至今,设立幸福“指数”、展开幸福“调查”、举办幸福“研讨会”等一系列行为是在“科学”框架下全面认识、客观对待、合理提升幸福的重要措施与方法,具有组织性、客观性和权威性,是“幸福”概念科学化的有力体现。

表3 子库4和子库5中“幸福”与科学类词汇共现索引行

序号	子库4和子库5中“幸福”科学化表达的索引行		
1	近年来,一组一组数据忠实记录着衡阳 人民幸福	指数	的上扬走势……

① 王德峰:《民主德国采取多种措施 保证老人晚年生活幸福》,《人民日报》1988年1月6日,第7版。

② 《匈牙利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指出 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87年1月12日,第6版。

续 表

序号	子库 4 和子库 5 中“幸福”科学化表达的索引行		
2	因而有必要加深对幸福	指数	的理解,科学地对待幸福指数。
3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小康社会与幸福社区”理论	研讨会	日前在苏州市举行。
4	2012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	调查	结果在京发布。
5	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张湘权表示,本次	调查	的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幸福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6	而从“幸福	经济学	”的维度出发,“民生倾斜”不等于“幸福倾斜”。
7	《幸福	经济学	》是一门尝试性新型课程,从开始筹备到公开讲课,走过了六年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4. “幸福”: 内外兼备,不断丰富

美国的“happiness”经历了由外向内的转变^①,但从表 2 可知,“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框架一直存在于幸福二阶搭配词的认知域中,构成“幸福”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含义有所差异。我们参考方秋明对幸福内外本质的论述^②,将各子库中“幸福”Top 30 二阶搭配词中表示“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框架的词汇提取出来,制成表 4。

表 4 各子库中“幸福”二阶搭配词的内外表征

子库 1		子库 2		子库 3		子库 4		子库 5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斗争	土地	团结	吃饭	家庭	市场	家庭	棋牌室	奋斗	蓝天
紧密	读书	全家	学习	文明	经济	尊严	活动室	中国梦	绿水青山
团结	穿着	激动	住	我家	住	和谐	经济	胜利	教育
感动	衣	感谢	养老院	民主	吃	笑声	住户	家庭	环境
家	讨饭	关心	身体	愉快	治病		教育	奋进	健康

① Shigehiro Oishi, Jesse Graham, Selin Kesebir, et al., “Concepts of Happiness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9, no. 5 (April 2013), pp. 559—577.

② 方秋明:《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关于幸福内涵的一点探索》,《兰州学刊》2014 年第 7 期,第 12—17 页。

续 表

子库 1		子库 2		子库 3		子库 4		子库 5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内在	外在
光荣	大炮	温暖	人口	平等	治愚		治安	温暖	滑雪
忠诚	健康				治穷		高速公路		经济
					计划生育		上网		餐桌
									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表 4 可知,在不同历史时期,“幸福”的涵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内在精神上,家庭始终是“幸福”的重要组成。外在物质上,饮食、健康、教育在“幸福”内涵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不同历史阶段的“幸福”具有其独特性,展现了“幸福”概念的演变历程。子库 1 时期,“幸福”内在表征为“斗争”,即面对困难、勇于斗争的“团结”与“紧密”,这不仅带来幸福感受,也是无上崇高的精神“光荣”。这一时期出现许多相关表达,例如“以从事那样崇高的斗争为幸福”^①“革命就要斗争,斗争就是幸福”^②等。土地和国防则成为幸福的外在表征。子库 2 时期与前一阶段相似,均强调面对困难的“团结”一致。这一时期,既要解决十年特殊时期的遗留问题,又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因此统一群众思想、凝聚共同力量成为精神建设的重要任务。此外,“人口”成为“幸福”概念的新要素。子库 3 时期,平等、民主、文明的价值观成为幸福的重要内涵。“创建文明幸福的家庭是亿万群众的共同心愿”^③“幸福意味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④等表达均凸显了文明、民主在幸福构建中的重要价值。此外,外在物质中,经济类词汇,如“市场”“经济”“治穷”等成为“幸福”的核心二阶搭配词。子库 4 时期,内在精神上,“和谐”成为幸福生活的重要参数。物质层面,经济表征词“住户”成为影响幸福的重要指标;“棋牌室”“活动室”等基础设施增强了人民的幸福感;而得益于新世纪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上网”成为中国人的新型幸福体验。子库 5 时期,“奋斗”成为幸福的内在精神特质,凸显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with 创造力。而“中国梦”的提出将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相连,幸福的涵义由个人拓展至国家层面,彰显出幸福概念的民族性与独特性。外在物质层面,生态类词汇“蓝天”“绿水青山”“环境”“公园”等首次进入 Top 30 词表。“幸福”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宜居环境成为幸福生活的必需。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幸福”概念兼具内在精神和外在物质的双核内

① 戈松：《斗争就是幸福——送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同志》，《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12 日，第 8 版。
② 张国良：《“革命就要斗争，斗争就是幸福”——摘自刘英俊同志的日记和书信》，《人民日报》1966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
③ 徐惟诚：《倡导家庭美德 建设幸福家庭》，《人民日报》1996 年 11 月 29 日，第 9 版。
④ 陈瑛：《为人民谋幸福的重大举措》，《人民日报》2002 年 9 月 19 日，第 9 版。

涵,但不同历史阶段,内在和外在的平衡各有倚重,内在精神“团结斗争—文明和谐—奋斗”的变化,外在物质“土地—经济—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幸福”概念内涵演变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生动符号展现。

(三)“幸福”概念演变的社会影响因素

1. 社会宏观分析

社会宏观语境不仅是概念生成与传播的基础土壤,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对概念的理解与认知。在“幸福”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思潮与执政理念的动态变化,构成了其语义变迁的重要宏观驱动力。

1)“幸福”与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矛盾体现不同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着社会发展性质,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①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动了“幸福”概念的演变。1949年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具备两大特点,并与“幸福”内涵相适应。其一,从对抗性到非对抗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阶级对立,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社会发展,亦成为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因此,这一时期“幸福”的阶级特征显著,“斗争”成为“幸福”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生产力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呈现出非对抗性特征,与幸福内涵的“文明—和谐—奋斗”的非斗争性相一致。其二,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强调物质与文化的双重需要。外在物质的丰富与内在精神的充实是大众的普遍需求,亦是国家治理的着力点。在发现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幸福概念呈现出内外兼备、不断发展的特征。

2)“幸福”与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反映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社会思潮影响了人们对“幸福”概念的认知。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中将幸福寄托于强者与权威的观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处于民智启蒙阶段的国民仍具有延续性影响,因此“幸福”概念呈现被动性。此外,“家和万事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等格言以及“读书以致仕”“孟母三迁”等传统故事强化了教育与家庭在幸福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第二,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贯穿“幸福”概念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关注幸福的实践性^②,即幸福的本质是真实的,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统一,强调基于社会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与需求的实现。在“幸福”的演变过程中,依赖他者的被动性逐渐降低而自我奋斗的主动性逐渐凸显,外在物质追求与内在精神富足并重,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生动体现。第三,科学主义思潮推动“幸福”的科学化。21世纪初,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求真务实的科学理念进而影响了国人对“幸福”概念的科学化理解。第四,民族主义思潮是“幸福”民族性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潮传入我国,具有分裂社会的潜在不良影响,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下复兴,强调民

① 武素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进认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年,第15页。

② 王鲁宁:《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论”中国化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成果探析》,《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5期,第52—58页。

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自觉,而“幸福”概念由世界性到民族性的演变正是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影响的现实体现。

3) “幸福”与执政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的理念贯穿各个时期,而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侧重点在实践中影响了人民对幸福的多样性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仍未完成,以革命手段完成革命未竟事业,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之中^①。“团结斗争”成为革命化执政理念的现实体现,也是赢得建设成果的重要措施。这一时期“斗争”思想深入人心,衍生出“斗争就是幸福”的概念内涵。改革开放后,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物质需求在“幸福”概念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亦影响了“幸福”概念的认知,科学认识幸福、全面探究幸福、可持续提高幸福成为幸福科学化重要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梦”的提出将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幸福”概念的民族性。此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亦成为“幸福”内涵内外兼备、不断丰富的见证。

2. 社会微观分析

社会宏观因素是推动“幸福”概念变迁的隐性驱动力,而不同时期有关幸福的社会事件则发挥具体且直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民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认知。

我们从数据中挖掘与“幸福”概念演变相关的社会线索,检索表2中二阶搭配词所在的文章,并以其中所明确报道的社会事件在各子库中出现的标准化频次为权重,提取权重排名前5位的事件进行可视化展示,制成图4。其中,次节点与中心节点“幸福”的距离越近、节点间的线越粗,代表该事件的权重越大。

子库1时期,首先,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权,还直接影响乡村繁荣和农民幸福。^②土改激发了农民对地主的阶级对立意识和革命斗争意识^③,将斗争塑造为争取生产资料、追求幸福生活的正义手段,进而影响了民众对于“幸福”斗争内涵的认知。其次,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历程,在当时被视为摆脱贫穷、通向幸福的必经之路。^④一方面,生产组织单位的转型强化了团结协作价值观。家庭不再是生产组织单位,劳动所得由生产队组织分配,个人收入与集体生产成果挂钩。另一方面,“政社合一”使得农民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均围绕集体展开。^⑤可以说,农业集体化将个人幸福与集体繁荣紧密相连,赋予了“幸福”互助合作、集体团结的内涵。此外,抗美援朝使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理念深入百姓生活,强化了“斗争

① 刘华超:《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1年,第39页。

② 徐建飞:《新时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借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7日,第7版。

③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76—94页。

④ 张纯、赵丹:《实现人民幸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的价值取向》,《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30—35页。

⑤ 管胜昔:《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年,第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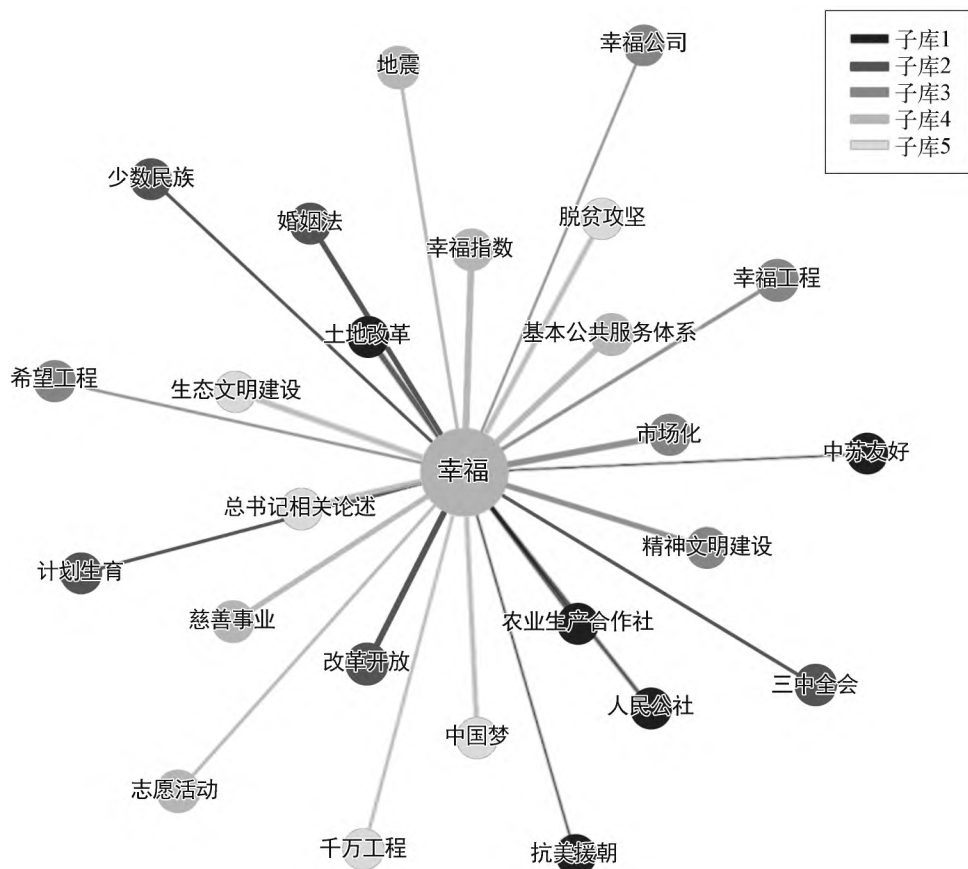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子库中的“幸福事件”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就是幸福”的观念。中苏友好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参考框架,苏联式的幸福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参照。

子库2时期,“幸福”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这与改革开放以及婚姻法的颁布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政治权力开始向公民权利转型^①,公民权利的凸显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觉醒和高扬。^②同时,改革开放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引入外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个人的经济自主性。个人努力开始成为实现幸福的重要途径,推动了幸福自我意识的崛起。此外,1980年版婚姻法以婚姻关系为纽带,增强了“幸福”的自我意识特征。婚姻法强调自愿原则并提倡夫妻平等,这使得个体的感情与选择成为决定婚姻的核心因素,提升了个人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的主体性。

子库3时期,首先,市场化深入推进,促使经济成为“幸福”的外在表征。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效果初步显现的重要时期,有关“幸福企业”“幸福公司”的报

① 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第87—91页。

② 孙春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年第1期,第21—23页。

道频现。市场化带来了物质福利提升,经济迅猛发展背后是老百姓钱袋子更鼓了,生活质量更高的社会现实。其次,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在理想、道德、文化诸方面^①,其广泛实施为“幸福”注入了文明道德意义。政策层面,1996年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践层面,全国范围内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创建评选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全面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综合素质,使平等、民主、文明的价值观成为当时幸福的重要内在组成。此外,“幸福工程”“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的实施,使得“幸福”概念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维度和精神价值。关注儿童、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的需求,使“幸福”与社会支持和文化尊重相联系。

子库4时期,幸福指数的统计标志着幸福概念迈入科学化进程。2006年,国家统计局将其纳入官方统计,幸福指数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把尺子。同年,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政府亦将幸福指数纳入工作考核,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幸福指数统计与考核推动社会治理关注民生福祉,深化了“幸福”概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内涵。其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是民生幸福标杆的三大动力之一。^②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多地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如社区“活动室”“棋牌室”等,满足了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2012年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涵盖教育、就业、医疗等九大领域,保障了人民全生命周期所需的九大要素^③,是实现人民精神与物质幸福生活的制度安排。此外,慈善事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它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公平与增强凝聚力,为幸福生活注入社会支持和道德情操。

子库5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幸福的论述扩展了“幸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等论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幸福观”,揭示了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脱贫攻坚的胜利正是中华儿女共享幸福的印证,其精神深化了“奋斗幸福观”的内涵。此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幸福”概念的重要内涵。《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蓝天常驻逐渐成为群众切实感受到的生态红利,强化了幸福感与良好生态环境的关联。同时,“海绵城市”“口袋公园”等生态优化举措的推广,有效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质性的幸福体验。在乡村地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显著改善了农村生态面貌,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④。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战略升级,反映了国家对幸福内涵的不断

① 徐堃:《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幸福观的选择》,《社会科学》1989年第12期,第42—44页。

② 刁鹏飞:《民生幸福标杆的实践总结》,《光明日报》2023年8月31日,第11版。

③ 康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耦合、功能定位和作用机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58—65页。

④ 严金明、蔡大伟、夏方舟:《以“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第72—84页。

拓展与深化。总之,新时代幸福的内在和外在本质都在不断深化和丰富,全方位全周期的幸福进入大众视野。

结 语

概念具有镜像作用,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幸福”概念的演变折射出时代的波澜起伏。本文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挖掘“幸福”概念的整体发展脉络,经过宏观与微观分析后发现,1949年至2024年,国民对“幸福”的关注度呈现整体增强趋势,“幸福”概念经历了“世界性到民族性”“被动性到主动性”“科学化”“内外兼具,不断丰富”的演变过程。这折射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思潮、执政理念等宏观因素以及社会事件等微观因素对于概念演变的浸染与影响。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验证了前人关于幸福影响因子的观点,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幸福”在家庭、教育、健康等方面具有内涵一致性,21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生态亦成为幸福的重要表征,这与前人的观点相符^①。第二,重新认识了现代社会“幸福”概念“由外向内”^②以及“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分离”^③等观点。1949年至2024年,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始终构成“幸福”的双重内核,且表征形式日益丰富、多元。第三,本研究从历时视角出发,发现了前人质性研究未充分触及的特征与变化,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历史纵深;此外,本文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推进概念史研究的“数字转向”,增强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总之,作为普世性概念的“幸福”在中国呈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内涵与趋势,这是概念深度参与时代建构、见证社会发展的鲜活案例,可以加深我们对概念演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的理解,为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未来,一方面可在时间范围上拓宽研究视野,考察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幸福概念综合历时演变;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考察“幸福”的相近/相关词,例如单字词“福”、含有“福”字的双/多字词、近义词“快乐”“幸运”等概念的演变趋势并比较其异同,从而形成对“幸福”概念群及其背后社会变迁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Constructed by *People's Da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1949—2024)

YAN Tong, WU Xinyi, HU Kaibao

Abstract: Improving national happines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ssence of “happiness”

① 邢占军、胡文静:《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变迁(2002—2019):一项横断历史元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29—138页。

② Shigehiro Oishi, Jesse Graham, Selin Kesebir, et al., “Concepts of Happiness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9, no. 5 (April 2013), pp. 559—577.

③ 施文辉:《幸福的本质及其现实建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年,第78页。

remains a subject of debate.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not only mirrors the shifts in public’s perception of its essence, but also reveal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s paper builds the token-based semantic vector spaces using data from the database of *People’s Daily*, aiming to trace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from 1949 to 2024. It is found that since 1949, public attention to “happiness” has shown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a “passive” to an “active” stance, a shift from a “global” to a “national” perspective, an inclination towards a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a continuous enrichment that encompass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Macrosocial factors such as major societal contradictions, prevailing social ideologies,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micro factors such as significant social events related to happiness, have been key driver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Keywords: happiness; digital humanities; semantic vector spaces; digital conceptual history; *People’s Daily*

(责任编辑:徐 丽)